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

回忆南方局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丛书》编辑说明

一、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给立准史料，研究党史作好基础性工作。

二、丛书的范围包括从五四运动到重庆解放这一时期内重庆和川东地区党史上的有关重大事件和问题，根据需要有条件，确定选题，逐步汇集。

三、丛书各辑的内容，主要的是有关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包括历史文献、报刊资料、敌伪档案，和当时当事人的回忆等。至于具体的编辑体例，则根据各辑的实际情况分别确定，不求划一。

有的选题由于缺乏完整的上述资料，则由执笔者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进行适当的编写。

对于各辑的内容和编辑情况，均在各辑的后记中，加以说明。

四、在一部分专辑中，前面有一篇概述性的专题文章，后面附有大事记，均系执笔者的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不是定论。

各辑中尽可能附一些有关的照片资料。

五、本丛书作为内部资料，供老同志和有关研究机构、专业工作者、党史爱好者参考。我们认为这些资料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很好的教材。

六、由于我们掌握的史料不足，水平有限，本丛书在资料选择、编辑体例、对历史事件的评述等各方面的缺点错误必不可免，敬请批评指正，帮助我们不断改进。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目 录

关于南方局的几点情况	孔 原(1)
南方局的调查研究与机要电台工作	童小鹏(5)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回忆与体会	许涤新(11)
南方局组织部的人员组成及其工作情况	荣高棠(21)
抗战时期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	方卓芬(39)
对南方局广西统战部工作的回忆	刘隆华(60)
贵阳交通站和南方局的秘密交通与特别会计工作	袁超俊(76)
在南方局工作的七年	赵 继(98)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领导妇女运动概况	廖似光(113)
我对“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一些回忆 和看法	陆慧年(119)
南方局妇委领导的中上层妇女统战工作的 片断回忆	卢竞如(121)
高风亮节、浩气长存 ——忆念妈妈饶国模同志	刘圣化(127)
回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	黄静汶、黄慧珠(145)
我为党做的一点工作	周宗琼(154)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新华日报》概况	徐迈进(166)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工运点滴	张志昂(196)
难忘的回忆	杜贵文(202)

关于南方局的几点情况

孔 原

我于一九四〇年五月随周副主席从延安来重庆，一九四三年六月又随周副主席回延安，在南方局工作时间不长，比起在座的原在南方局工作的同志来，知道的情况较少，好在许涤新、童小鹏、荣高棠、陈舜瑶几位同志都准备在大会发言，他们一定会讲得比我更全面、系统。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工作，并把这两者配合武装斗争，如协助川陕、川黔革命根据地，支持新四军，建立云南武装斗争等，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统区的工作对全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国统区的工作应当怎样认识和估价，最近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写了一个材料，我认为它是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

这个材料，是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不久，周副主席的一次讲话的回忆。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做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周副主席在讲话中说，董老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专门向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了南方局的工作，主席听了汇报以后说，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现在看来，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

的，包括所谓的河南的“红旗党”在内。过去看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的时候，对国民党总是估计高了，其实国民党是烂透了的，所以群众反对他，我们有群众可以依靠。所以，他们内部有很多矛盾，我们可以加以利用，只要我们能够依靠群众，善于利用矛盾，就能够生存、发展，取得胜利。对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过去偏重于强调合法斗争，合法斗争里，又偏重于强调法律合法，忽视社会合法。其实《水浒》里面，宋江搞梁山泊，搞武装，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就是搞社会合法，把非法变为合法的斗争。

我认为，吴南生同志提供的这个历史资料是有参考价值的。

关于白区党的工作，历史上曾经有过不正确的认识。康生、陈伯达之流，更别有用心地加以污蔑，诽谤四川、河南等地的党是什么“红旗党”、“特务党”、“国民党的党”……，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我个人曾被戴上“大后方红旗党首领”的帽子，和我同时期在四川工作的许多同志也受到牵连。这些，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到了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危害，肯定了刘少奇同志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当然都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周恩来同志长期领导白区工作，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有许多创造发展。这些宝贵的经验，也很值得认真进行总结。

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针对当时国统区的形势和我党工作的需要，决定在南方局领导下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这两个委员会一个是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管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工作，以方方同志为书记，参加领导的还有张文彬同志以及涂振农等；另一个是西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南委”，管川东、川康、云南、贵州、鄂西、湖南

等地区工作，以孔原为书记，参加领导的还有钱瑛、廖志高、于江震等同志。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特务机关发布《处置异党活动办法》，或者叫做《处置共党条例》，在他们所列的大后方地下党的黑名单中，头一个名字就是我的真姓名陈铁铮。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周副主席决定把我从地下党调回到办事处，担任南方局组织部的工作，由钱瑛同志接任“西南委”书记。

党在白区的组织是在敌人的心脏里进行战斗，工作环境十分险恶。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实行疯狂的白色恐怖，全国党的组织和党员遭到国民党残酷的血腥屠杀和镇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多次受到大破坏、大摧残。一九三〇年是李立三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以后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白区工作遭受严重失败。抗战初期，有些地方又受到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使许多党的秘密组织、党员及革命力量暴露，受到很大损失。国民党施行了三次反共高潮。面对这种形势，并为着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应采取的工作路线是：一方面实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交友；另一方面，实行荫蔽精干的政策，也就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以后又加上防止急躁和暴露，克服那种不愿长期埋伏的急躁情绪。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南方局所属的地方党的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运，农运，学运，军队工作，情报工作等，都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实行了坚决的转变，采取了许多实事求是的，从实际出发的具体方针和做法，例如实行“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即党员要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正确运用“三有”的策略，即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秘密与公开，合法与非法的区别与配合等一套工作方式、方法和策略原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把工作深入到国民党上层人物里头去，对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子女

也作工作，还采取了各种打入国民党上层以及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决定在国民党强迫参加时，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实行革命的两面派策略；对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广泛深入地进行组织纪律和气节教育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策略方法，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使党的组织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避免了遭受破坏，使白区的党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响应、支援和迎接大军解放西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文是根据孔原同志1982年在成都召开的西南四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上的讲话整理的，在收入本集时，作了些删改。题目也是编者加的。）

南方局的调查研究与机要电台工作

童 小 鹏

今天，我只讲南方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南方局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就是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在南方局的整体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南方局的党史资料中，它亦是很重要的一部份。在这部份工作中，涉及我们党的很多机密，请同志们不要随便发表。今天，我只是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今后，还希望纪念馆和其他方面的同志多作调查访问，召开专题座谈会，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并希望与这方面工作有关的同志写一些回忆资料。

南方局的情报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南方局机构中，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情报部门，有些时间有个别的同志专管这工作。是南方局全体同志共同进行的工作，包括地方党、统战人士、民主党派、进步的青年和朋友都做这项工作。就连《新华日报》的报童、办事处的采买，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都做社会动态的调查研究工作。南方局的情报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与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一九三九年，南方局成立初期，只有周怡和张玉琴俩同志专做情报工作，我们开玩笑说他俩是“夫妻店”，以后他们回延安了。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同志都负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每人将自己知道的各种情况，都向组织汇报，最后集中在周恩来同志那里。恩来同志不在时由董老负责，工委时期由王若飞同志负责。总而言之，南方局在重庆那七、八年间，所有国民党的重要情报及国外的重要情况，都由南方局直接报告给延安党中

央，使党中央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从而制定和采取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使我党立于“百战百胜”的不败之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二、三次反共高潮。重要的情况我们事先都知道，尤其是第三次，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的部队都已经准备好了，事先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报告给延安。当然不光是重庆，西安等其他方面也有情报报告延安。党中央立即在延安召开群众大会，事先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罪恶，发消息、发通电、登报，向外界公开披露国民党的阴谋。最后，使蒋介石不敢下手，阴谋归于破产。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报，就是一九四一年夏，希特勒定于六月二十二日对苏联发动突然的全面进攻，南方局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马上报告给延安，延安又马上转告斯大林，斯大林起初还不大相信，后来证明了我们的情报准确，得到他的称赞。

这个重要的情报是怎么得到的呢？它就是靠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靠我们的党员同志广交朋友，靠长期积累的调查研究工作。而不是像国民党情报部门的特务那样，靠的是秘密手段、金钱美女、鸡鸣狗盗。最先得到这个情报的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阎宝航同志。他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广交朋友，在同一个国民党驻德国大使馆官员的谈话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报告给南方局，南方局立即报告中央。南方局的情报工作，中央认为是做得好的。

周恩来同志概括了我党情报工作的经验是“寓情报于统战”，这就是南方局情报工作的总方针。南方局的情报工作就是紧紧地依靠统一战线工作，依靠广交朋友，在统一战线和广交朋友的工作中做调查研究，直接间接地获取可靠的情报。有些是来自地下组织。少数长期埋伏在国民党重要机关的秘密党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也有我们的秘密关系，更多的则是国民党内的进步分子。他们憎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情并支持我党，他们把国民党的许多文件、决议给我们看。国民党的特务

机关也不是铁板一块，除我党直接打入的同志外，也有少数倾向进步、同我党有所接触的人，直接间接地告诉我们各方面的情报。孔原同志在任西南工委负责人工作时，我们就首先得知国民党特务已经侦察到陈铁铮（即孔原）同志在重庆活动，并已注视其行踪，因为有叛徒认识他，南方局就将孔原同志及时撤回，其他很多同志也都是这样保护下来了。所以，在纠正了王明只搞公开工作不搞秘密工作的错误后，西南地区的党组织总的说来没有遭受大的损失。部份组织虽遭到破坏，但是一些主要领导同志在其处境已有危险的时候，都能够从容不迫地安全转移，包括在“皖南事变”后那样的白色恐怖形势下，许多同志都安全转移、隐蔽疏散，使党免受损失，这与南方局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

当年，周恩来同志的工作很忙，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每天晚饭后，听取各方面负责同志的汇报，审阅各方面送来的文电、情报，研究次日的工作计划。常常是夜已经很深了，同志们都已熟睡，恩来同志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的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将一天所得到的情报加以综合分析，重要的亲自拟稿或他口述由我记录，用电报发给中央，没有价值的，则当时烧掉。

第二个问题是南方局的机要、电台工作。大家都知道我是个“鸡鸭行长”，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也应该有责任把南方局的机要、电台工作向大家讲讲，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讲一下主要的情况。

在南方局多方面的工作中，还有一方面重要的工作，一条重要的战线。这条战线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在空中进行的，也就是我们的机要、电台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一个确保密码与反破译的斗争。

为什么很多当年在南方局、办事处工作过的老同志，今天一到红岩三楼就说“我们没有发言权”，原因就在于三楼机要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绝对保密性，对自己内部的同志也绝对保密。很多在红岩工作过好几年的同志，也没有上过一次三楼。因此，

他们对三楼工作的情况不了解。当时，整个在红岩工作的同志都很艰苦，但说句公道话，在三楼工作的同志比大家还要辛苦一点。大家都知道，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长，三楼的房间就像鸽子笼一样，又低又小又窄，窗户开在房顶上，阳光直射房里，丝风不透，酷热难当，真犹如火炉一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同志仍然坚持工作。再就是熬夜，刚才讲了，恩来同志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向党中央发电报，每天深夜，都有许多发向延安党中央的电报，同时，又有延安党中央对重庆南方局工作的指示。机要、电台的同志是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工作，保证这条“看不见的战线”畅通无阻。

当年国民党陪都的重庆，处处是“马路不平”，时时是“电灯不明”。电压不够，我们就用巧妙的方法增加电压。又经常停电，我们就自己摇马达发电，不仅有专门的人摇，还动员一、二楼的干部们都来摇。白天，气候变化大，国民党的电台多，干扰很大，我们就利用下半夜通电，特别是电台被国民党封存以后，我们用秘密小电台困难更大，还要想法躲避国民党的侦察电台。我们的电台很小，只有五瓦特，得选择最好的气候，最好的时间，集中最大的精力，电波才能越过巴山蜀水，穿越秦岭渭河，到达延安，若是碰上阴雨天，那通电就非常困难了。

尤其重要的是要保证我们的密码不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破译我们同延安通电的密码。他们把我们同延安往返的电码都抄收下来，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请了很多所谓的“破译专家”、“数学专家”来进行破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我们重要的密码被破译过，我们最机密的密码是恩来同志亲自研究创造的。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借口办事处不能设立电台而无理封了我们的电台。当然，我们事先作了准备，他查封了公开的，我们就设立秘密的，依靠党员或社会上进步朋友的帮助，在外面架设了秘密电台，而且不止一处，他查封了一个，迫使我们建立起好几

个。后来，国民党明知我们办事处三楼有秘密电台，但他不敢来查，只有躲在那里抄收，破译，但又破译不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我们曾提出恢复办事处的公开电台，因为谈判需要用。但蒋介石不答应，只允许我们将电文交给他们军政部的电台向延安拍发。为了迷惑敌人，隐蔽我们的秘密电台，我们表面上同意了。每天由我们机要科的同志乱七八糟地给他们写些电码，简直可以说是“无字天书”，交给国民党军政部的电台去拍发，同时，我们的秘密电台才在真正地延安通报，随时保持着联系，传达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充分运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巧妙灵活的斗争艺术。他一方面公开同蒋介石进行唇枪舌剑的谈判斗争；另一方面则通过秘密电台指挥着上党战役，消灭了对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迷梦。毛主席对上党前线我军的将领们说：你们打得越好，把敌人消灭得越多，我的安全就越能得到保障。为了同蒋介石抢占东北这块战略要地，毛主席还亲自起草了许多电文，指示延安所有能抽出的中央委员立即到东北去，指示冀东军区和山东黄克诚的部队，迅速从陆地和海上赶到东北，重武器不要带，必要时连轻武器也可以留下，只要我们有了人到东北，同东北的人民结合起来，就什么都有了。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这些战略决策，是多么的英明伟大。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秘密电台把这些英明的战略决策及时地准确地传达到延安，如果我们的密码被破译，就不知道要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准我们的人回延安，我们同延安的联系更加依靠我们的电台了。南方局审查干部的结论和以后整风学习的情况，都由电台拍发延安中央保存的。这样，使很多南方局回延安的干部，免遭了康生所谓“抢救运动”的迫害。

当时，我的身份是公开的机要科长。国民党警察每月要来检查一次，什么呼号啦、波长啦等等。有一次要检查我们的密码，我们没有同意。最后由董老亲笔给何应钦写了一封信，何应钦只得回信称：“免于检验”。

为了防止国民党的突然袭击，我们三楼专门有个放密码的保险柜。一份是绝密的，如遇突然袭击，随时可以毁掉，一份则是假的，以备国民党检查之用。我们办事处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在合法斗争中应用非法斗争的手段，非法与合法结合起来，用合法掩护非法。比如我们的电台向国民党登记，就只登台长和几个报务员，其余的男女同志，都是“家属、亲戚”，每人都准备了“口供”。“皖南事变”后，恩来同志亲自对办事处特别对我们机要科的同志进行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

在保证电台正常工作和提高电台老同志操作技术水平的同时，我们还自己办训练班，培养报务员、译电员，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经过训练，后来成为了译电员、报务员，以后又从育才学校调了几个青年学生来学习。

总的说来，我们机要战线的工作，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同国民党特务作了各种各样巧妙机智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干扰破坏，胜利地完成了南方局与党中央之间空中联系的光荣任务，做到了恩来同志所规定的“机密、准确、迅速”三项原则，成绩应归功于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努力。

（注：只供内部参考，不要公开引用和发表）

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资料组

（刘立群录音整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六日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回忆与体会

许 涤 新

一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是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有团结、有斗争的方针，是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号召，因而取得了巨大成绩的。

南方局是在国统区的心脏中进行战斗，进行统战工作的，而当时国民党的武装力量比我们大，它垄断了国家的政权和财权；它的统治区中，特别是重庆，那真是特务遍地。在那种情况下工作，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它的政治腐败、官吏贪污、通货膨胀、苛捐杂税，使得整个国统区民不聊生，民怨腾沸。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的陪都。民主党派都在这里集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民族资本家也大体在这里集中。我们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罪行的斗争中，争取中间民主党派，争取地方势力，争取知识份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认清形势，逐步摆脱国民党的影响，跟着我们一道前进。而多数民主党派、地方势力、高级知识份子和民族资本家，在不同程度上，是有可能跟着我们走的。要把这些有利条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决不能形式主义地用叫口号的办法，去执行党中央的政策；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当时的政治矛盾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各个中间党派和地方势力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处境

出发。只有从实际出发，并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采取适宜的方式，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能在统战工作中，实现党中央的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

二

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之一。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的政策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抗战八年他们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平江事件杀害了我们许多同志；皖南事变杀害了我们更多同志。对国民党的这种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倒行逆施，以周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

国民党的党员并不全部是假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在顽固派之外，还有一部分人是进步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于佑任、孙科、邵力子、张治中、贺耀祖、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倪斐君以及曹孟君等等，他（她）们是主张抗战，主张团结的。一般说，国民党中，主张抗战和团结的人并不是当权派；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合乎实际。举二个例，张治中和贺耀祖就是当时的当权派。张治中三上延安，他同赫尔利到延安陪毛主席到重庆；毛主席接见各方人士的“桂园”就是张主动借用的。双十停战协定签定之次日，由于周副主席的联系，他用飞机送主席到延安。当晚党中央在杨家岭设宴招待。张在席上说：“希望中共历史学家将来写历史时不要忘记我张治中三上延安”。1949年张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团长，在和谈时，坦率地“承认错误，承认失败，交出军权，交出政权”。和谈失败，张欣然接受周副主席劝告，留在北京，同我们合作。和平解放新疆，他是出了不少力的。贺耀祖早就同我们有联系，他的夫人倪斐君对南方局妇女组的工作，贡献颇大。在曲折的道路上，他们跟我们走，走进

新中国。还要谈一下陈布雷，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但是，我们通过他的女儿陈莲（中共党员），专做他的工作，促使陈布雷在政治上感到矛盾没法解脱。

对国民党顽固派和民主派的区别对待，促进了他们的分化。上述这一批人，除了于佑任和孙科之外，都跟着我们进入新中国。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以李济深、何香凝为首的国民党进步派，于1948年秋，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在解放后，对于留在大陆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做了不少团结教育工作；今天，为了台湾回归祖国，这个党派正在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对国民党机关（包括报纸），我们也进行了统战工作。不少政治经济情报，是从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中下层干部得到的。他们甚至把原件拿出来给我们抄录。

三

中间民主党派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当时的民主党派有救国会、第三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和青年党。在这里，救国会是中间党派中的左翼，总的说，它是相信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相信中国的前途，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七君子中的邹韬奋和沙千里后来都加入中共；李公朴后来在昆明为民主事业而献出生命；但是，它也在分化。七君子中王造时同国民党CC勾搭了；章乃器后来脱离了救国会。尽管如此，救国会总不失其为进步的民主党派。可惜的是，在解放初期，事前没有同周副主席商量，这个进步的民主党派迫不及待地自动解散了。在这些民主党派中，右翼是青年党和国社党。青年党是二十年代反动的“国家主义派”。在英美派教授中，它有点力量。“中华书局”有一个时期被控制在这个党的手里。但人数不多。国社党的人数更少。这二个党，虽然参加过“民主政团同盟”，但后来都被蒋介石用利禄收买了。在

这些民主党派中，代表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是中间力量的典型人物。他的中华职教社的社员，大部份是上海许多工商企业的老板；江南一带的开明地主，同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两党之间，长期坚持中间立场。周副主席、董老和王若飞对黄做了不少工作。最后，他终于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了新中国。

皖南事变之后，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国社党、青年党在重庆成立“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在香港出版《光明日报》。他们在重庆招待记者，蒋介石大为恼火。太平洋战争之后，该报搬重庆。不久，改名为“民主同盟”，即不以政团而以个人为成员。“民主政团同盟”之成立，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的。蒋认为围击新四军，屠杀新四军的指战人员，并取消新四军的番号，打击了中共，其他党派必然会低头跟他走；而各个中间党派却认为蒋既然敢于打击强有力的中共，那么，小党派只有团结起来，才不会被蒋介石吞吃。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在当时的国内政局，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皖南事变以前，不少民主党派是站在中间，有时甚至倾向国民党的；皖南事变以后，不少民主党派感到国民党的横暴，感到自己生存的危机，它们虽然站在中间，但逐步同我党靠拢。救国会是一贯同我们合作的。第三党和中华职教社，在这个时候，有着明显的变化。国社党和青年党虽然后来被蒋所收买（曾琦当了“国府委员”，左舜生、陈启天当了部长，蒋匀田当了次长），但总的说，民主同盟并不因此就丧失其中间偏左的性质。

四

南方局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郭老、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洪深、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都是周副主席和董老经常接触的朋友。郭老在那时的文化界，成为吸引了千万青年的旗帜！在皖南事变后的十个月左右，周副主席每晚到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各方朋